

并非另类：
女性
文学批评

王春荣 ● 著



大学时代



人到中年



耳顺之年

王春荣，笔名春容，女，大连人。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全国女性文学研究会委员、辽宁省妇女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作协特邀评论家。出版《新女性文学论纲》等个人学术专著6部。主编、参编学术著作、教材9部。在《文学评论》《社会科学辑刊》《辽宁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等对所发论文多有转载。科研成果曾荣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辽宁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8项）、辽宁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女性文学奖、中国妇女理论奖等多种奖项。偶有散文作品发表，出版哲学随笔《顺其自然》，以及《苦瓜吟》《水龙吟》等艺术散文。

前言：文学批评的性别维度

在我们这个时代，两性差别即使算不上最热门的话题，也肯定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按海德格尔（Heidegger）的说法，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热衷探讨一个问题，而且仅仅是一个。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关键课题。

——〔法〕露丝·依利格瑞：《性别差异》

20世纪女性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了一定的积累，也有了创造典范的历史。但是，女性的状况，还有女性和性别差异的思想，随着时代的推移也发生了变化。但在20世纪后半期，人们觉察到女性的问题同时也是男性的问题。男性、女性的差别研究表明，压抑女性的社会文化结构也在阻碍男性的发展，性别研究使女性学的研究领域更加扩大了。

——〔日〕水田亲子：《女性的自我与表现·致中国读者》

文学是有性别的。文学批评也同样可以性别维度加以审视和评价。这种观点和理念置于30年前会被视为奇谈怪论，异端邪说。这是因为人类文化体系中一直存在性别歧视的缘故。“性别歧视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话题。”（刘象愚：《文学理论·总序二》，西方现代批评译丛，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30年后的今天，文学批评界早已见怪不怪，不但认可了这种观念，而且当我们检视一下中国文化界、文学批评界，敢于声称自己与“女性”这一关键词毫

无干系的文化人、文学批评家几乎没有。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正在以一个崭新的学科的身份而独立于人文社科领域，堂而皇之地成为博士学位招生方向之一。这一信息表明，新时期三十年中国文化观念的莫大转变，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语境是多么祥和、宽松、新颖。所以，本书采用了一种论辩的口吻，命名为《并非另类：女性文学批评》，其意正是要表明女性文学批评同样是20世纪大文学批评框架中的题中之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籍“95世妇会”为契机，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高潮再起，成为自“五四”新女性文学之后的又一高峰期。女性文学批评一直成为学界、特别是女学者的学术兴趣和当代文学批评热点。尽管，我们曾经被好心人告知：女性文学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命题。但是，我本人还是执迷不悟，乐此不疲。从1995~2010年整整十五年，本人在这一领域潜心钻研，颇有心得。先后出版了2部个人学术专著《新女性文学论纲》和《女性生存与女性文化诗学》；主编了《女性声音的诗学》，合著《〈繁星〉〈春水〉诠释与解读》，并有幸参与由乔以钢、林丹娅主编的教育部“十一五”规划项目《女性文学教程》等书籍的编撰。同时，先后发表了几十篇女性文论。其间，由我和我的硕士生、博士生共同提出的“现代女性文论”、“女性声音的诗学”、“女性文化诗学”等范畴和概念，在女性文学研究领域都曾引起关注，获得中肯的评价。例如，由张炯、白桦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06卷）中《“两性和谐”：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终极追求——第七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一文中这样写到：“女性文学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张炯、吴思敬、金燕玉、谭湘、林丹娅女士，以及在女性文学研究界卓有成果的乔以钢、陈骏涛、阎纯德、林树明、任一鸣、屈雅君、崔卫平、王红旗、李玲、赵树勤、王春荣、董丽敏、谢玉娥、朱育颖、降红燕、王敏、沈红芳等一百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规模盛大的会议。”（见第317页）同文，在总结大会取得的成

果时点评：“如何凸现女性文学的主体性，女性文学语言应是一个最根本的特质。王春荣教授在《张扬生命本体的语言》中指出了建构‘女性声音的诗学’的诸种意义。独到地发现了女性文学真正昭示性别意义的关键。”（见第318页）这些言论在当代文学批评界有一定的权威性，所列举的专家学者的名字也基本上汇聚了该领域的学者群体，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抄录这些文字，在于证明这些年来，一直试图在该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使这种声音能够引起一点回音和共鸣，事实证明我以自己的实绩跻身于女性文学研究的群体之中，并得到同行的认可，个中的酸甜苦辣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特别值得欣慰的是，因此带起了我身边的一批年轻女学者参与该领域的研究工作。

本书的思想内容基本上印证了我的学术研究兴趣和心得体会。其中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能够见证我本人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甚至疑惑：在中国有所谓“女权主义者”吗？李银河是吗？中国本土具备生成“女权主义者”的语境吗？），但女性文学批评却是我始终不渝的研究方向。当然，女性文学研究并非我的唯一方向和兴趣，“中国当代文学史”及史学研究也是我一直热爱并执教的领域，《文学史话语权威的确立与发展》就是我和我的弟子们共同研究的学术结晶，该书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2008·济南会议），也获得了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0年），同样获得良好评价。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文学史家陈美兰教授在给本人的亲笔信中指出：“《文学史话语权威的确立与发展》出于多位写作者之手，涉及的材料又极为繁多，但在您和吴玉杰教授的主持下，对‘当代文学史’撰写的演进过程及各种文学史话语的特点，都梳理得十分清晰，评价也比较公允。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可以商榷之处……论著特设专章论述女学者的文学史研究，颇为新颖，也许是出于您和您的学术同仁对女性的关注和偏爱。”（2008.8.3）女性文学也是文学史的重要构成，二者并无抵触，甚至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学史观念的挑战，把女性文学研究置于中国当代学术史的宏阔视野中，理所当然。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主要观点和内容曾以论文的形式分别公开发表在不同的学术刊物上。本书依据女性文学批评不同问题域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章，“女性与文学性别”，作为女性文学的本体论，是要确认一个曾经被质疑而实则毋庸置疑的命题：文学是有性别的。并从不同的角度，纵横论述了女性与文学性别之间的血缘关系，试图回答“女性文学何以生成”、“何谓女性文学”，以及“女性文学何为”等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目前似乎已经算不上什么问题了，但它在众声喧哗的场域中发出了本人的学术声音，表达了女性群体的肺腑之言。

第二章，“女性与文学理论”，不仅把女性文论视为中国文论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充分估价现代女性文论对中国文论建设的特殊意义，认为中国文论建设的合理框架中女性文论是不可或缺的，它不仅表明中国文论的革命性，也体现了中国文论的和谐性、均衡性，这乃是一种生态文论观。本章梳理了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的审美演进，界定了“女性诗学”的范畴及思想理路，理智地反思了女性文学批评的极端化和怨怼情绪，提出了建设“性别诗学”的理论目标。

第三章，“女性与地域文学”，对处于被历史和主流批评遮蔽状态的“东北女作家群”，做出了宏观的描述，对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一以贯之的“草根情怀”“底层写作”进行了分析，特别收录了对本土女作家康启昌、于金兰、王秀杰、素素（当时的素素尚未获得“鲁迅文学奖”）、女真等作家作品的短论（遗憾的是对于像孙惠芬、马秋芬、张大威、石杰等女作家的评论文章因为没有发表，或者原稿没留电子文本，未能收入，对她们的创作在“东北女作家群”中都有概述和评点。）本章同时向一直勤奋耕耘在文学园地的当代辽宁女作家致敬。

第四章，“女性与男性文本”，超越女性写作主体，而是以“性别理论”视角观照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抒写和评价，女性文本对男性文本的改写等现象。特别是《性别维度：王充闾诗文的性别关注》和关于刘兆林散文对女性心理的审美透析，是以一种双性别视角，试图切实

地做出两性叙事的性别文化差异比较，从而切入“性别诗学”，而不仅仅是“女性主义诗学”建构的宏大系统。本章还对成熟期的女性中篇小说的成就、特质做出了阐发，特别对女性小说的“双性”话语特征发表了意见。女性文学的最高境界既不是“抄袭”男性话语的习惯性写作，也不是硬钻牛角尖，刻意与男性话语对立，甚至与整个男性世界对抗，而是如何表达公众审美意向的同时，又能做到女性审美的个性化写作。

第五章，“女性与电影的‘蒙太奇’”，女性与电影的关系密切，历史久远。女性文学可谓女性电影的“源泉”。但是，女性与电影的关系一直处于被动的、被看的尴尬处境，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电影几乎都把女性、特别是理想型的“美女”置于影片的看点，供人观赏，久而久之，包括女性观众也认同了这种刻板的“女性形象”，甚至把它当成一种偶像妄加崇拜。不过，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到来，女性与电影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女性电影”或“女性主义电影”的出现打破了男性一统天下的电影文化格局，以打碎男性创造的刻板“女性形象”为目标的艺术革命，改善了女性与电影的“蒙太奇”关系，对立的、冲突的关系趋于松散，诉诸女性意识、女性审美、女性制作的影片出现了。本章对于女性电影的中国版、女性电影批评的要义、男性导演的女性形象塑造等作了点评，同时以此呈现女性文学的图像化景观。

本书在每一章的文前都设有“题记”，援引东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作为本章的一个思想参照。这些言论在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中曾被反复引用，既是参照，也是构成中国本土女性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这些文论的特点是观点鲜明，思想穿透力强，文笔清爽，文采飞扬。当然，这些语言的意蕴背后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这一点我们必须心中有数，加以文化警觉，免得“食而不化”。是为序。

——作者，2012年

目 录

第一章 女性与文学性别	3
第一节 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理论前导	3
第二节 女性生存与审美创构	8
一、“女性写作”与传统习俗	8
二、女性审美日常化的合法性与局限性	17
第三节 女性文学的性别特征	26
一、女性文学的三种风格流派	26
二、女性叙事文体的散文化倾向	36
第二章 女性与文学理论	49
第一节 现代女性文论	49
一、现代女性文论对中国文论建设的特殊意义	49
二、女性文学批评的独特价值与审美衍进	54
第二节 女性文化诗学	64
一、现代女性文化诗学的范畴及思想理路	64
二、张扬性别主体的话语形态：“女性声音的诗学”	79
第三节 女性文学批评的历史与现状	92
一、百年中国妇女文学批评	92
二、反思、调整与超越	
——21 世纪初的女性文学批评	100
三、超越生命、超越时空的精彩存在	
——新世纪十年萧红研究状况分析	112

第三章 女性与地域文学	125
第一节 主体性与“东北女作家群”	125
一、问题的提出和“东北女作家群”的命名	125
二、东北女作家主体性、群体性的建构过程	128
三、“新东北”对“老东北”审美精神的继承与转换	131
四、一以贯之的“草根情怀”和“底层叙事”	134
第二节 女性是天生的散文家	137
一、关于《女人书简》的书简	137
二、《哭过长夜》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	140
三、绿色空间的文化审美建构：《水鸟集》	146
四、一个唯美的女性声音	
——散文集《情感底片》	155
第三节 女性与现代小说	158
一、金兰散文创作中的小说元素	158
二、鲁野/康启昌夫妇“生了个漂亮的孩子”	
——中篇小说《西城泪》	163
三、女真（张颖）小说创作的审美发现	168
第四章 女性与男性文本	175
第一节 男性散文的女性视角	175
一、性别维度：王充闾诗文的性别关注	175
二、女性心理的审美透视	
——刘兆林散文集《和鱼去散步》	193
第二节 女性文学的“双性”话语	198
一、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198
二、小说不仅是成熟男性的艺术形式	
——新世纪女性中篇小说	207
第五章 女性与电影的“蒙太奇”	223
第一节 中国电影的新景观：女性电影	223

一、女性文学的影像化	223
第二节 以女性的名义：女性电影批评	231
一、分歧中的“女性电影”	232
二、谢晋和黄蜀芹的目光	235
三、罗彻斯特：“男子汉”？“重婚犯”？	237
第三节 张暖忻和她的“纯电影”说	240
一、创新意识	241
二、文化意识	241
三、美学意识	242
四、自我意识	242
第四节 电影的性别表述	243
一、《秋菊打官司》：创意在哪里？	244
二、英雄气与女性美的融合	246

为了使对两性差异的研究工作能够开展起来，我们需要在思想领域中和道德规范上进行一次革命。对于主体与作品、主体与世界、主体与宇宙、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等各种关系，我们都必须重新作出解释。这里首先应当说，虽然这个主体向往一种平等或中立的状态，但在作品中它却总是被表达为一种男性，因为，至少在法国，“人类”这个词是阳性的，而不是一个中性词。

—— [法] 露丝·依利格瑞：《性别差异》

不要以原始模型的先验论看女性，要从制度的角度看女性，也就是说女人是由制度形成的。每一个女性都是有自我的，要用制度的观点重新分析女性的原始模型。这些是重读近代文学必要的视点。近代文学批评缺乏的，正是把女性的自我当作思想课题的视点。

—— [日] 水田宗子：《女性的自我与表现·致中国读者》

第一章 女性与文学性别

第一节 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理论前导

任何文艺现象的发生都基于特定的语境，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角度说，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生成首先是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妇女运动开创的社会现实提供了全新的创作题材。诚如著名诗人徐志摩在《文学上的妇女解放》（1933）中所说：“无疑义的，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与同一时代的现实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所以近百年来汹涌澎湃的妇女解放运动，在文学上也都有着明显的反映了。”当然，如果没有“精神领袖”的指引，“人之女”也不会从蒙昧状态中觉醒，不可能走上文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女性文学的生成全赖“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影响，特别是新文化革命的思想先驱所开创的妇女学理论的启发和引导。倘若没有妇女学理论做前导，现代女性文学的出现也只能停留在自发的状态，而不会有长足进步。“五四”时期的妇女学理论在激活知识女性的女性意识，帮助女作家深刻认识旧传统旧礼教的吃人本质，重塑女性独立人格等方面都起到了直接的积极的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时期的妇女学理论应当被视为女性文化诗学体系的重要构成。

鲜明的妇女问题意识构成“五四”时期妇女学理论的突出特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妇女悲剧性命运首先在于没有人（包括女性自身）把妇女问题作为“问题”提出来加以思考和研究，这显然是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表现。“男性中心主义”文化观根本无视这一问题的客观存在，女性尚未意识到自身的问题能够被作为问

题提出来，结果妇女问题就自然地被历史地遮蔽起来，人为地变成一个历史盲点，或者干脆就把它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把妇女问题作为问题提出，正是对被遮蔽的历史书写的一种文化质疑，即对妇女问题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思，从而唤醒处于麻木和沉睡中的妇女。“在这解放的时代，女子问题实在是最重要的问题。世界的女权，在这个时代正在蓬蓬勃勃的气象。”“不承认女子有人格！我们中国人还配说文明！若要说文明，就不能不承认这是个‘半身不遂’的文明！我们中国人配说人道？何以对家庭的女子，就不以人道相待呢？难道有饭把她吃，有屋给她睡，就算做人道主义吗？老实说，那是‘猪道主义’！女子解放是刻不容缓的事。”这是早期著名中国文学史家罗家伦为呼吁女子受教育权而发表的《大学应当为女子开放》（1919）中的一番激情洋溢的言论。“五四”妇女学文论，可以说没有一篇不是把妇女问题作为首要问题进行探讨的，可见在当时思想界对此已达成了共识。

“五四”妇女学理论在突出妇女问题意识的同时，又系统地梳理了妇女问题的方方面面，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了阐述，令人警醒，给人以启迪。妇女的婚姻问题，妇女的经济独立问题，妇女的人格问题，妇女社交和两性关系问题，妇女的受教育和生育问题等等，有关妇女切身利益和人权问题几乎无一遗漏。女作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一改旧妇女文学“闺中怨”的弊习，将审美视角投向了与妇女问题相关的一切家庭的和社会的问题，从中探求青年的出路和民族的前途。以冰心和庐隐为代表的女作家及其“问题小说”兴起于“五四”时期绝非偶然，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为人生的主题是文学与生活紧密联系的范式。特别是冰心借小说《一个忧郁的青年》的主人公之口所发出的疑问：这世界到处都是问题，满脑子都是问题——喊出了当时广大知识青年的心声。

“五四”妇女学理论对妇女的历史地位和社会现状做了总结和反思，指出妇女解放的历史必然性。

这一点不仅全体女同胞理当意识到，全体国民都应当清醒，因为这绝非妇女自身的事情。李达在他的《妇女解放论》（1919）中指出：“世界女子过去一大部分的历史，是被男子征服的历史。在这一时期，

道德上风俗上习惯上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一切种种，凡是女子所处地位，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男子好像天神，是主人。女子好比是奴隶，囚犯。好像这世界是男子独占的世界，不是男女共有的世界。女子地位的惨痛，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了！这也不单是中国，就是往时欧美各国，也是一样的，不过中国是个礼仪之邦，男子管理女子的手段，比较的厉害一点罢了。”张慰慈也在《女子解放与家庭改组》（1919）中说：“我们中国是讲纲常名教的礼仪之邦，关于怎样去限制女子的自由，怎样去使得女子不能发展他们的能力，同时剥夺他们人格的种种法子，总算完备极了。我们的女子受了数千年传下来的遗毒，就失了他们的知觉，变成了男子的一种极妙的玩物。其中有几个最为社会所称扬的，也不过晓得怎样去做男子的‘贤妻良母’罢了。这样的制度，行了数千年，没有人觉得不合理；大家反而以为是‘天经地义’的制度。”基于这样的社会历史状况，李大钊在《战后妇人问题》（1919）中也指出：“妇人与男子虽然属性不同，而在社会上也同男子一样，有他们的地位，在生活上他们有他们的要求，在法律上有他们的权利，他们岂能久甘在男子的脚下受践踏呢？”既然“不甘”于这样的践踏，那么，就必然要奋起反抗，妇女解放势在必然。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理论讨论最多的是妇女解放的首要问题是什么。如沈雁冰在《我们该怎样预备去谈妇女解放问题》（1920）中所说：“这道德方面的不平等，是第一该解放的。”数千年来封建礼教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纲常犹如沉重的枷锁，必须砸碎它妇女才可能获得身心自由。封建礼教既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纲常，其目的则无疑都是维护“男权中心”的利益的，而不会考虑女性的利益；其标准也一定是男人的标准，而不会考虑女性的愿望和要求。讨论中，也有人认为女子解放的首要问题是“女子参政权”，即“争女权”；尔后便是分家，即“家庭革命”。但这两种观点都受到了批评。妇女界的领袖人物向警予指出女子争参政权仅是贵族小姐太太的事，它对于整个妇女界，尤其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劳工妇女毫无意义；分家独立也并不意味着经济独立，更何况女子离家以后将无法生活，解放也无从谈起。向警予在《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1920）中认为女子的根本希望在“三自”——各个自觉，各个自决，各个自动。虽然向警予当年提出的

“三自”与今天的妇女行动口号的“三自”（自尊、自强、自立）提法不同，但其实质是一样的，强调的都是妇女自身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归根结底还是妇女意识的觉醒。

在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中，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叶绍钧等都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理论观点。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1916）列举了孔子之道加予女子的种种纲常，号召她们“离经叛道”，树立现代文明观。鲁迅的《我之节烈观》以强烈的思辨力驳斥了旧礼教压迫妇女的“节烈观”，指出“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与人生将来又好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胡适认为贞操问题“在世界上受了几千年无意识的迷信，到近几十年中，方才有些西洋学者正式讨论这问题的意义，”并批评了那些“全无心肝”的贞操观。

妇女解放靠谁？这是“五四”时期妇女学理论提出的又一现实问题。茅盾先生指出，妇女也是有阶级差别的，妇女解放既不能靠贵族阶层的太太小姐，又暂时靠不了为生计而挣扎的劳工妇女。“有希望的只是第二等妇女了——便是中等人家的太太和小姐了。”因为第一阶层的贵族女子并不了解广大妇女的疾苦，她们没有平民意识，只有贵族意识，她们认为妇女解放便是争取参政权，讨几个政治席位；这在为生计而挣扎的女子看来纯粹是“吃饱了撑的”，是有闲阶级百无聊赖的“解放游戏”。中产阶级的女子虽不如贵族女子有背景，有势力，但她们还有经济实力求学受教育，比劳工女子要幸运，要开明；同时她们对下情也比较容易了解，不像贵族女子与劳工之间隔得那么远。正因为这样，妇女解放的先行者角色便历史地落在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肩上。这一分析，合乎当时社会状况和女界实际，即便对今天的知识女性也有极大的反思价值和指导意义。因此，现代妇女解放需要由先进思想指导，由掌握人类先进文化的知识女性和广大劳工妇女团结一致，共同完成。

“五四”妇女学理论将妇女问题作为问题提出的实质是什么？

首先，妇女问题是个社会问题。这一点经典作家早有论述，他们坚持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深度、革命胜利的标志的观点。陈独秀在《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1921）中认为，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在“社

会主义”，“如果把妇女问题分得零零碎碎，如教育，职业，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的，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才好”；“在社会主义之下，男女都要力作，未成年的时候，受社会公共教育，成年以后，在社会公共劳动。在家庭不至受家庭压迫，结婚后不受男子压迫，因社会主义认男女皆有人格，女子不能附属于父，也不能附属于夫。”所以，“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联络，否则离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的。”社会主义的实现证明了确实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给妇女带来最大限度的解放，中国妇女只有在今天才获得了参政权、受教育权、就业权，在各个领域充分体现了自身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了极大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

其次，妇女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是男女两性共同的事情，它直接影响男子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样态和生活质量，关系全人类的发展与和谐。“五四”时期的男性思想家最先意识到这一点。陈独秀在《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1921）中就号召妇女解放“这不单是女子的事，而男子也是这样。所以希望男女要全部努力于社会主义，男女实行联合弱者以抗强者”。重温“五四”新女性文学，其中不少作品都将青年男女作为“同盟者”加以塑造，既真实地反映了男女两性的现实关系，又勾画了理想的两性关系结构。

再次，妇女问题是个文化问题，这一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民族文化建设前景。“女人是文化的尺度。”20世纪初的妇女问题专家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女人既是民族文化的体现者，也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者。她们的问题既是民族文化的共性问题，也是自身文化素质问题，历史在她们身上体现的文化成分主要是负面色彩。“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把妇女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作为文化问题去解决并非权宜之计，因为千百年来妇女问题已经构成了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问题不解决，旧文化断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索妇女问题的答案也就是寻找民族文化发展的途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化的革命远比体制革命艰难得多，长久得多。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实现了半个多世纪，妇女问题仍然需要下大力气去解决的原因。在社会事务中，人们在席位上、待遇上可能情愿给妇女以“平等”，但在观念上却轻易不能彻底放弃对妇女的偏见。21世